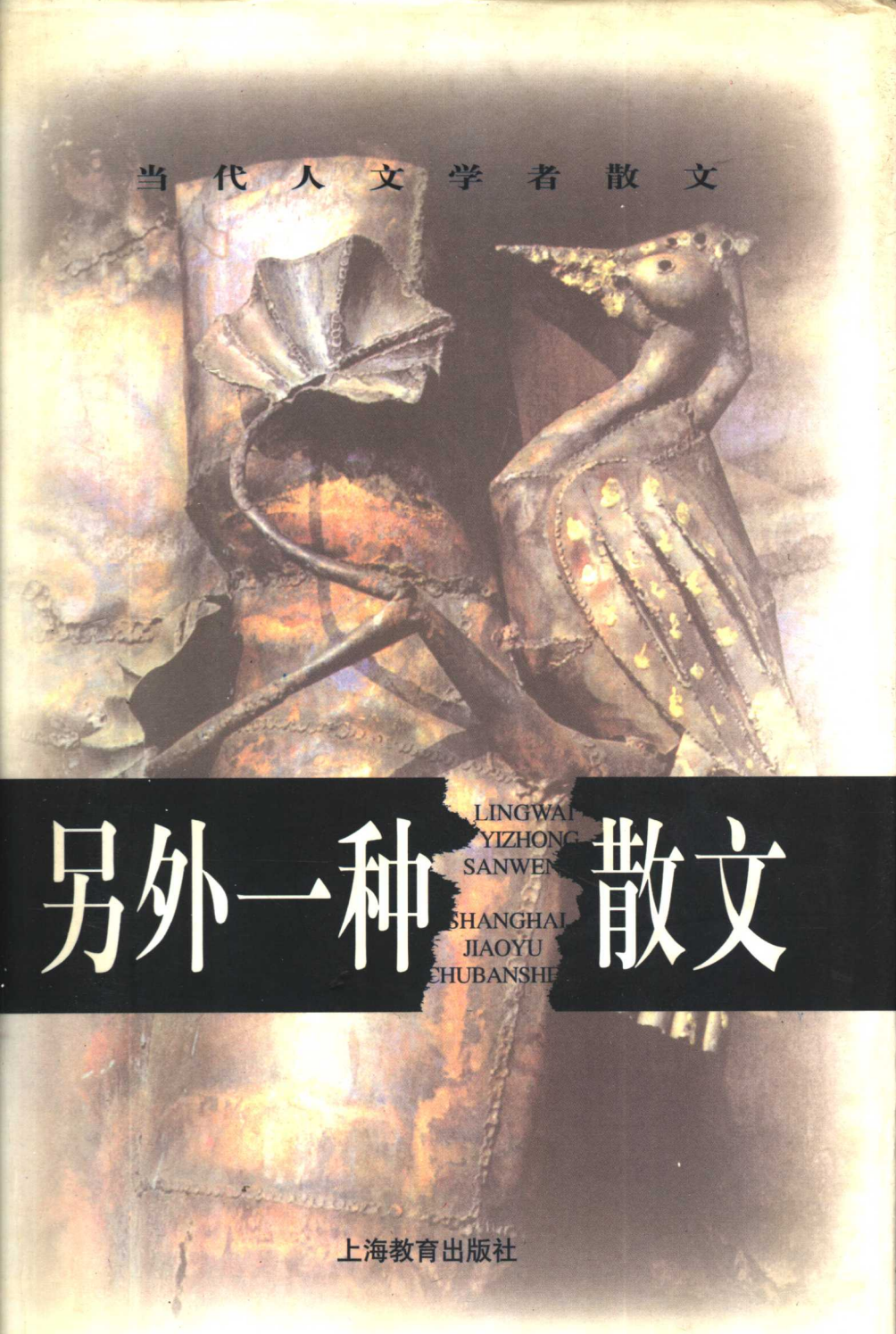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人文学者散文



LINGWAI
YIZHONG
SANWEN
SHANGHAI
JIAOYU
CHUBANSHE

另外一种散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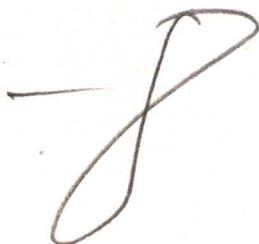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010112213760 郑州大学图书馆

44.618
517

人
文
学
者
散
文



另外一种散文

蓝克林 编

LINGWAIYIZHONG SANWEN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

44.618
517

0.02

Qax 37/01

另外一种散文

——当代人文学者散文

蓝 克 林 编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

(邮政编码: 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492,000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200 本

ISBN 7-5320-5435-7/G·5677 定价:(特精)33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T: 56628900×13

目 录

钱理群(1939—)	
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	(1)
——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	
吴福辉(1939—)	
王府井·霞飞路·京都花见小路	(16)
封面女郎与学院脸孔	(22)
蓝棣之(1940—)	
大师的风范	(26)
语言成了问题	(31)
周振鹤(1941—)	
秋冬秋冬	(36)
王富仁(1941—)	
《文选》情结	(51)
施康强(1942—)	
北京乎!	(60)
1936年5月21日,上海	(67)
郭宏安(1943—)	
墓中人语	(75)
谢天振(1944—)	
文学翻译: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	(85)
赵 园(1945—)	

闲话北大·····	(98)
周国平(1945—)	
爱书家的乐趣·····	(107)
私人写作·····	(114)
葛剑雄(1945—)	
乱世的两难选择：冯道其人其事 ·····	(123)
钱满素(1946—)	
守法与犯法·····	(135)
朱正琳(1947—)	
“放逐自己在家中”的生涯·····	(145)
——读《鼠疫》随笔	
读《围城》多想了一点点·····	(158)
李 零(1948—)	
上海有个陈建敏·····	(163)
惧内秘辛·····	(172)
高瑞泉(1948—)	
林语堂这个中国人·····	(178)
智慧之境·····	(189)
陈子善(1948—)	
人去楼空谁有知·····	(198)
——张爱玲在上海的故居	
“有一片孤帆闪耀着白光”·····	(206)
——漫谈三位现代作家的藏书票	
夏中义(1949—)	
学术囚徒·····	(210)
徐 麟(1949—)	

《绝望的抗战》序	(217)
陈克艰(1949—)	
乌云周围的金边	(225)
黄 梅(1950—)	
“听”杨绛先生话文学	(233)
葛兆光(1950—)	
唐诗过后是宋词	(243)
尘封在阁楼中的往事	(252)
李庆西(1951—)	
人去山空鹤不归	(257)
——炼金术的“无用之用”	
垆边食事	(261)
朱学勤(1952—)	
笑着的,叫着的,哭着的	(270)
思想史上的失踪者	(281)
张汝伦(1953—)	
活在历史中	(296)
乡愁	(304)
夏晓虹(1953—)	
寂寞身后事	(311)
蔡 翔(1953—)	
底层	(325)
陈思和(1954—)	
教授三章	(337)
奥斯维辛之后的诗	(350)
陈平原(1954—)	

学者的人间情怀·····	(356)
“厕所文化”·····	(364)
陆建德(1954—)	
巴尔特·围棋·阅读·····	(372)
徐 晓(1954—)	
无题往事·····	(380)
何怀宏(1954—)	
受难、隐遁与沉默 ·····	(404)
梭罗和他的湖·····	(412)
杨自伍(1955—)	
米兰·昆德拉 ·····	(424)
季红真(1955—)	
阿城：俯仰天地的魂魄 ·····	(434)
刘 东(1955—)	
看球的门道·····	(440)
吴 亮(1955—)	
城市札记(五则)·····	(447)
王晓明(1955—)	
另外一种散文·····	(458)
——读周作人的《乌篷船》	
冬天的回忆·····	(463)
——关于艾芜和沙汀	
胡晓明(1955—)	
读《馥墨》·····	(474)
一切诚念终当相遇·····	(478)
卫建民(1955—)	

乔家大院	(487)
申慧辉(1956—)	
“做女人真好”	(497)
漂泊者的世纪	(502)
——《漂泊的家园》序	
雷 颐(1956—)	
文人还会被尊敬么	(510)
李 辉(1956—)	
碑石	(517)
——关于吴晗的随想	
许纪霖(1957—)	
在诗意与残忍之间	(544)
孤独让她如此美丽	(553)
黄 平(1957—)	
教化的困惑	(558)
南 帆(1957—)	
面相·脸谱·面具	(564)
服装琐谈	(573)
李天纲(1957—)	
东海西海 心同理同	(578)
姑苏城,涛声能否依旧	(589)
李公明(1957—)	
诗意的栖居	(595)
——闲话文人	
岑寂与风雪的俄罗斯	(605)
费振钟(1958—)	

明朝文人的民间倾向	(610)
陈少明(1958—)	
社会如何是江湖	(624)
汪 晖(1959—)	
明暗之间	(628)
——记章石承先生	
北欧笔记三章	(638)
谢 泳(1961—)	
作家的情书	(649)
王彬彬(1962—)	
“追求事业是愚蠢的,特丽莎……”	(655)
当不得真的辜鸿铭	(667)
杨念群(1964—)	
书生襟抱本无垠	(671)
——杨度的潇洒与困惑	
李书磊(1964—)	
山西访旧	(680)
伍立杨(1964—)	
文字灵幻	(693)
王振忠(1964—)	
学究慨世	(702)
斜阳残照徽州梦	(712)
编后记	蓝克林 (727)

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

——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

钱理群

钱理群 1939年3月出生，浙江杭州人。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班。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兼职导师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主要著作有《心灵的探寻》、《周作人传》等十余部。

六年前，在先生 70 寿辰的祝词中，我称先生为“鲁迅影响下的一代学者”的代表，先生是曾经微笑首肯的。先生一生研究鲁迅，宣传鲁迅，以鲁迅精神启迪后代，这方面的业绩是人所共知的。我想强调的却是先生自身主体精神与治学道路，以至治学方法上所受鲁迅的影响，这也许是更为重要的。作为一位鲁迅专家，先生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“鲁迅的方向”对于现代中国及文学发展的意义；按照我的理解，鲁迅的“方向”意义，不仅在于他的思想与创作对于后人的典范与启示作用，而且在于鲁迅以他特具的精神力

量,影响与造就了一代又一代“鲁迅式”的作家、学者及“鲁迅式”的分子和“鲁迅式”的中国人——鲁迅的“立人”理想正是在这里得到了部分的实现,这也是鲁迅对于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贡献。所谓“鲁迅精神”,在本质上乃是现代科学民主精神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,“鲁迅式”的作家、学者、分子和“鲁迅式”的中国人,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,而又与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,新的人,他们是建设现代中国的“脊梁”,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。

在我看来,王瑶师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“鲁迅式”的学者,“鲁迅式”的分子。

在先生的追悼会上,我们几个弟子送上一副挽联:“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,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。”“魏晋风度”与“五四精神”正是对先生人格精神、气质的概括,也同时显示了先生与鲁迅内在精神之相通。先生在他的有很大影响的《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》一文中,曾引用鲁迅的话,以“清峻和通脱”来说明“魏晋风度”的特点,并且指出,鲁迅说他自己“有时很峻急,有时又很随便”,“其实就是清峻和通脱,这主要也是受了魏晋文章的影响”。而王瑶师自己,于“清峻”(“峻急”)与“通脱”(“随便”)这两个方面都是有所继承,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的。凡有机会与先生接触过的人,大概都为他那机智的谈锋、诙谐的语言、豁达的气度、潇洒的风姿,以及极有特色的、可以称之为“王瑶之笑”的笑声所吸引。这其实都是先生精神中“通脱”面的外在表现。在朋友、弟子圈中传诵一时的先生的“名文”——《自我介绍》(这也是先生自己最满意的文字之一),让我们最为倾心的,也正是这一点。“……邇来垂垂老矣,华发满颠,齿转黄黑,颇符‘颠

倒黑白’之讥；而浓茗时啜，烟斗常衔，亦谙‘水深火热’之味。惟乡音未改，出语多谐，时乘单车横冲直撞，似犹未失故态耳。”这里，幽默与通达中暗含着辛酸与倔强，包孕着多么丰厚的人生体验！恐怕只有联系着 20 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艰辛曲折的历史道路，才能多少领悟这“三言两语”背后复杂的内涵。此言此语，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，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。记得有一次先生突然对我说：“我现在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是‘垂死挣扎’，什么事也不做呢，又是‘坐以待毙’。——与其‘坐以待毙’，不如‘垂死挣扎’！”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。我听了却为之一震，并且立刻联想起鲁迅的《过客》——“过客”不是明知前面是“坟”，还要不停地往前走么？还有，鲁迅在《死火》里，不是同样面临“动则烧完，不动则冻灭”的两难境地，最后断然选择“与其冻灭，不如烧完”么？经历了“水深火热”的种种灾难，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敏锐者，早已看透了一切，抛弃了对过去、现实以及未来（“终极目标”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达到了思想的“超越”，此所谓“通脱”，也即“彻悟”，但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们并未因此消极隐退，仍然以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精神积极进取（或曰“挣扎”）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“绝望中的抗战”。在我看来，这是集中地代表了 20 世纪现代中华民族新的民族精神的，而王瑶师正是这一精神在学术界的重要代表。他的幽默，“出语多谐”因为内蕴着这种精神而别具深厚的力量和魅力。我常对朋友与学生说，王瑶师的幽默，不仅是一种很高的智慧，而且表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，为我辈难以企及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因此，先生的“通脱”（“随便”）是必然与“清峻”（“峻急”）互补的。在先生仙逝后，很多人在回忆中都强调了先生的宽

容,这自然是真实的。但在我这样的常在他身边的弟子的记忆中,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先生不宽容的那一面。先生是直接承继了魏晋文人及鲁迅先生的“愤世嫉俗”、“嫉恶如仇”的传统的;对于他不以为然的人与事,他是径直施以“青白眼”的。因此,先生让人永远不会忘怀的,不仅是他豁达的笑声,更是他那严厉地审视一切的锐利的给人以威压的目光。先生对人的要求、评价毋宁说是峻急的;先生也和鲁迅一样,特别善于洞察人们表面行为、言辞背后的隐秘心理,当事人或者不察,或者察而不便言、不愿言、不敢言,先生常一语道破,而且采用的是“王瑶式”的表达方式,就像鲁迅所说的“起浑名”一样,简括犀利,入木三分,深刻到了“刻毒”的地步。这类“刻毒”的批评先生不常说,偶有表露,便让人永远难忘。从外表看,先生是“冷”多于“热”的,我甚至觉得,他是有意地把自己对于子女、弟子、朋友的爱包裹起来,甚至连亲近的人也要推到一定的距离之外,他常告诫我不要与学生“拉拉扯扯”——主要不是指非正常的牵扯,而是指感情的纠缠。记得鲁迅也是竭力摆脱“爱”之类的感情的牵连的,鲁迅甚至不愿意公开流露自己的感情,包括痛苦在内。王瑶师也如此;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,一次我在他面前流露出我内心的软弱与痛苦,哭了起来,竟遭到了先生严厉的训斥。后来我读了鲁迅的一篇文章;鲁迅说,他不肯公开显示痛苦,是不愿让仇敌感到快意,更不愿成为庸人饭后的谈资,或徒然给亲人增添烦恼。我于是终于懂得了先生的一番苦心。先生自己也确实从未在我面前流露他的痛苦,我也但愿留在我记忆中的,永远是那时而畅怀大笑,时而向人投以锐利一瞥的,通达、坚强的王瑶师,我不愿看见,也不敢想象,老泪纵横的先生将是一个什么模样!……

正在酝酿写这篇文章,收到了一位名叫饶向阳的山区中学语文教员的来信,谈到他对“鲁迅精神”的理解。他以为,有两类思想家都是不健全的,一类“把思想作为一种手段而随意揉捏”,“不求真”,另一类“醉心于纯思想领域内的设计与构筑,在自己的天地里自足”,“少务实”;而鲁迅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达到了“求真”与“务实”的统一。——应该说,这是一个相当独到的观察。我却因此而想到了王瑶师,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与鲁迅相通的。先生对于鲁迅有一个我称之为经典式的评价:“鲁迅的伟大正在于,他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,让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评论,以至批判——他几乎是唯一可以不加删削、修改地出版全集,而绝不会损害他的形象的现代中国思想家、文学家。”——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,先生在作这一番评价时,所流露出的无限神往的神情;他接着反过来向我一一列举在中国现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,结论是:在这一点上,他们都不能与鲁迅相比。先生于是快活地,甚至有几分恶作剧似地,哈哈大笑起来。这又使我联想起鲁迅当年对“做戏的虚无党”的批判与嘲笑;鲁迅说,中国人,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,身上都有一股永远也褪不掉的“做戏的虚无党”的气息。而鲁迅却是绝少(或者没有)这种气息的知识分子之一;他真正做到了“表里如一”,终身不渝,以“求真”为生命唯一追求,他的失误也是“求真”过程中的失误,因此无须删削、修改与掩饰。我不敢说王瑶师已经达到了鲁迅这样的境界,但他理解,并且自觉地追求这一境界,却是毫无疑问的。先生在《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——清醒的现实主义》一文中,十分小心地将鲁迅式的“清醒的现实主义”与

“无理想的爬行的现实主义者”区分开来,并引用鲁迅在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里的分析,“把‘破坏’分为‘革新的破坏’与‘寇盗式的破坏’、‘奴才式的破坏’两类”,强调二者的“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内心有‘理想的光’”。这不仅是先生对鲁迅“求真”精神的一种深刻理解,而且可以看作是先生的自我写照:他正是一位有理想、有情操的,把鲁迅的“求真”精神化为自己血肉的学者。这一品格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;我以为,这正是王瑶师的文学史研究(无论是中古文学史,还是现代文学史研究)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最根本的原因。

王瑶师不是那种“醉心于纯思想领域内的设计与构筑”的,缺乏现实感的迂阔的学者。先生的“务实”精神是表现在诸多方面的,但在我看来,最能显示先生的“现实感”的,莫过于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,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现实条件、环境下,从事科学研究的;他一刻也没有忘记:自己是一位中国的学者,因此,他经常提醒我要注意鲁迅那句名言:“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:一要生存,二要温饱,三要发展。”我要坦白地承认,在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没有注意,也不太理解先生的这一提醒。直到后来,经过了一些事实的教育,再重读先生的著述,才略有所悟。王瑶师早在他的《中古文学史论》中,即已注意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“志存保己”而处处持“至慎”态度的事实(《文人与酒》);在中国,首要的是“生存”,然后才谈得上“发展”,这是确乎如此的。在一次谈话中,先生还表示十分赞赏鲁迅关于唯其中国少有真正的战士,就更须注意保全战士生命的观点;他以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同样如此,每一次文化运动总要损伤一大批极有希望的研究者。这固然是极左路线的恶果,但作为研究者自身,却也不得不考虑如何“保全自己”的

问题。“如何做中国的学者”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，先生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。他一再告诫我，在学术研究中，既要有“求真”精神，绝不作违心之论，但也要注意掌握“什么时候，可说，不可说，说到什么程度”之类的分寸。后来，我读先生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，发现先生引用朱先生《论气节》一文中所说，“‘气’是积极的有所为，‘节’是消极的有所不为”，说的是同样的意思；先生自己于“有所为”与“有所不为”，时机、分寸都是把握得恰到好处的。这使我想起，人们常说鲁迅是一位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略家、策略家；其实，一切希望在中国“生存”下去的文人学者，都是不能不思考战略、策略、方法这类问题的，王瑶师不过是在这方面更为自觉而已。他一贯主张的“打太极拳”、“擦边球”以至“外圆内方”之类，在一定意义上，都是一种“自我保全”的手段。对于一个一意“求真”的学者来说，这样考虑，这样做，都是不得不然（而又是必须的），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精神痛苦的。而且，“外圆”与“内方”，“务实”与“求真”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，甚至可以说，“求真”、“内方”的要求是更为根本的，前者以后者为前提。不能“两全”时，先生是宁取后者的。出卖原则的“策略家”仍然是鲁迅与先生都嗤之以鼻的“做戏的虚无党”；坚持真理，爱憎分明，这才是先生的本色。

先生与鲁迅，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样，有着自己的精神痛苦。只是先生平时总是小心地不让人们（特别是比他年轻的朋友和学生辈）进入他的内心世界——我猜想，这与鲁迅常说的“我的思想太黑暗”，不愿从此影响年轻一代的心情，颇有些相近。我只是通过几件事多少感受到（或者领悟、理解到）他内心的某些痛苦。这种感受（领悟、理解）未

必准确,而且很难诉说,但我仍然要努力试一试。

那一年陪同先生、师母作了一次西安之游。在参观了秦兵马俑之后,又驱车游览了汉武帝茂陵,唐太宗昭陵,唐高宗、武则天合葬的乾陵,唐中宗定陵,以及霍去病墓前的大型圆雕。在游览过程中,先生兴致很高,一路谈笑风生,但归来的途中,却突然沉默了。开始我以为先生有些疲劳,并不在意;后来偶然一回头,发现先生神色异样的严肃忧郁,似乎含着难言的痛苦,这是在与先生接触中从未见过的,我呆住了。这时,只听见先生低低地说了一句:“我们真是不肖子孙,不肖子孙……”,我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听他大作发挥时,先生却嘎然止住,并且再也没有说话。我凝望着在暮色苍茫之中先生默默吸着烟斗的侧影,觉得似乎贴近了先生的内心却又说不清楚。几年后,我在先生的《念闻一多先生》一文中看到先生回忆闻一多将其书斋命名为“思唐室”,并且说:“就我听他讲唐诗的印象说,他对唐代文化和国力的繁荣强盛,确实是神往的,言辞间充满了感情。”联想起鲁迅所说的“遥想汉人多少因放……唐人也还不算弱”也是这样的满怀激情,先生痛苦地自责“不肖子孙”的情景重又浮在眼前;我于是懂得了,对于从鲁迅到闻一多到王瑶师这几代中国知识分子,“复兴中华民族”的要求已经融入生命与血肉,他们为之奋斗终生,献出了自己的一切,虽屡遭挫折,仍矢志不移,但目睹国家、民族依然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现实,他们不能不有“愧对祖先”的感慨,并因此承受着刻骨铭心的精神痛苦。面对先生(以及上溯到闻一多、鲁迅几代人)的这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,我不禁肃然起敬;但想到先生们的情感恐难为更年轻的一代所理解(在他们看来,先生们的这类“痛苦”未免有些“空泛”),我又不能